



从《周易》视角探析张骞出使西域当代启示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 邢春华

摘要：《周易》为中国传统文化大道之源，六经之首，封建帝王作为经邦治国必读之书。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其中就有《易经》博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取士的主要条件。当代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周易》的管理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等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周易》与天文学、中医学、物理学、数学、文学等也成为学界的热门。张骞是西汉时期一位外交家，对开通古代丝绸之路作出了杰出贡献，奠定了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基础。本文通过张骞和西汉《周易》热，结合《周易》“思变”和“忧患”主题，从《周易》管理学视角探析张骞出使西域当代启示。

关键词：张骞 〈周易〉 出使 西域

一、张骞和西汉《周易》热

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14年）字子文，西汉时期旅行家，外交家，探险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西汉成固人（今·西城固县）。关于张骞介绍，目前能见到可靠文献为司马迁所著《史记》及班固所著《汉书》。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从张骞和司马迁出生时间来看，张骞要比司马迁早出生19年，但他们同为一个时代之人，且二人同为陕西人，虽说出生早晚不同，但二人同为西汉时期官员。司马迁记述张骞“建元中为郎”^①。司马迁写《史记》既有社会因素，同时也有自己感情因素，但基本上是本着尊重历史事实态度创作的，所以他在《史记》中对张骞记述是本着历史事实，从史料真实情况考察，他记述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张骞的文献依据。但是看《史记·大宛列传》对张骞事迹记述，司马迁用笔重在记述张骞在西域的经历，而对张骞本人背景介绍只说“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只说明了张骞籍贯及官职，从官职可以判断张骞当为武官，而不是文职官员。本文从《周易》角度考察张骞出使西域的当代启示，重在考察张骞本人是否知晓

^① 郎，官名。秦置中郎，至西汉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王的侍卫，属光禄勋。汉朝武官的级别分：将军、中郎将、校尉三级。由于将军并不常置，有战事时才冠以统兵者将军之称，所以平时一般武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官职为中郎将，品秩为“比二千石”，掌管皇家卫队，属光禄勋管辖。到三国时期，有军功者越来越多，大量被封为将军，中郎将反而成为了中下级军官的职位。



《周易》，或者是否受到《周易》一书对其人生观及其价值观的影响。学界关于《周易》与司马迁《史记》关系已有公论：例如学者郑万耕认为“《史记》深受《周易》的影响……司马迁十分推崇《周易》，视其为圣人之书；‘致命遂志’是司马迁的最高价值追求；‘殊途同归’、‘易简’、‘时变’等观念是其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周易》中的很多辞句，成为其立论的依据。”^①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由此可知《周易》在西汉时期尤其汉武帝时期是“热”学，犹如当下“国学热”一样。关于西汉时期“易学热”也能从《汉书·张骞传》中找到依据。

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②

此处“天子发书《易》”，当然指的是《周易》一书了。“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为何把“好马”起名“天马”？

《周易·说卦传》中认为“乾，健也，……乾为马，……乾，天也，故称为父”。^③“天马”之名来自于《周易》《乾》卦“天健、马健”之意，也说明此马为良马，优种马。皇帝被称为“天子”，天子所骑之马当为“天马”。“乌孙马”改名为“天马”足可见西汉当时对《周易》之书的推崇。

西汉时期五经博士使公卿、大夫、士吏都成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和政权紧密相连，从而确立了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西汉的儒学博士，对经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既然汉武帝如此推崇《周易》，而张骞与司马迁为同一时代之官员，司马迁受《周易》影响深刻，且张骞又为“郎”官，张骞思想必然也受《周易》影响很深。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时间为公元前136年，此时汉武帝推行五经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条件时，不通晓五经，不通晓《周易》肯定不会被选拔为官员。张骞出生于公元前164年，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张骞为28岁，正是考取功名的最佳时期，也是步入仕途兼济天下的最好年华，由此推断张骞肯定通晓五经，尤其通晓《周易》，否则他不会选拔为“郎官”。可以推测《周易》一书对张骞“凿空”西域提供了理论及其精神指导，张骞出使西域之途所遇困境及危难也是他实践《周易》“忧患”主题的具体体现。

二、《周易》“思变”主题和“忧患”意识奠定了张骞“凿空”西域的基础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为《易》增置博士，说明汉武帝推崇《易》。《易》的主题是“变”，精髓则是忧患意识。“《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

① 郑万耕《〈史记〉与〈周易〉》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04期

② 班固《汉书·张骞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③ 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581-582-583页



道不虚行。”^①意思是说《周易》这部书（包含人生处世的哲学），不可须臾远离。……《周易》的道理可以启发人当出入行藏之际多加考虑遵守法则或度数，使人处内外隐显之时知晓警惕得失。又可以使人明白将来的忧患和往昔的事态。忧患意识，自周文王推演八卦成六十四之后，已经演变成中国文化的根文化，成为历代有作为统治者的治国理念。西汉前期，匈奴一直是中原民族的主要忧患。

据中国部分史籍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等县。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在战国末期，赵国大将李牧曾大败匈奴。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14年，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河套，屯兵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蒙恬从榆中（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秦、赵、燕5000余里旧长城，据阳山（阴山之北）逶迤而北，并修筑北起九原、南至云阳的直道，构成了北方漫长的防御线。蒙恬守北防十馀年，匈奴惧其威猛，不敢再犯。

西汉初期历经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社会经济破坏惨重，人民渴望稳定，国库空虚。而那时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却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发兵南下汉境抢掠骚扰。汉初前201年，韩王刘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美人计逃脱。强大的匈奴与虚弱的西汉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刘邦采纳娄敬提出与匈奴和亲的主张，汉朝主动送公主和大量的财物给匈奴，使他们停止对汉朝的骚扰，后来的惠帝、文帝、景帝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先后向匈奴单于冒顿、老上、军臣遣送公主，并奉送大批财物，以获得暂时边境安稳。尽管如此，匈奴还时常侵扰边防，烧杀抢掠。从汉高帝九年（前200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是属于西汉和亲政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和亲，意在以汉匈姻亲关系和相当数目的财物来换取匈奴停止对汉边境的掠夺，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增强国力。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当时人民富足，国库充盈，社会安定。汉武帝加强中央专制权力，军事力量也强大起来，已有足够的力量与匈奴抗衡。汉武帝认为以前“和亲”政策是屈辱，废除前朝和亲政策，而开始筹划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这意味着汉匈关系开始发生新的转变。从

^① 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555页



汉高祖到汉武帝对匈奴政策变化，体现了《周易》“变化”主题，即根据时势和情境适时进行“变通”之道。“变通者，趣时者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①意思是说变化会通，是趋向有利和和宜时机。……《周易》的道理就在于穷极转向变化，变化则能通畅，通畅则能长久，长久则无所不利。随着西汉国力强盛，适时调整国家政策，从屈膝求和变为积极作为，则是对《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道从理论到实践的运用。因此，《周易》“思变”主题和“忧患”精髓促使汉武帝及时调整国家外交政策，张骞在此境遇下出使西域，则是把汉武帝掌握《周易》“思变”和“忧患”意识落在实践之中。如果说汉武帝是《周易》思想的提倡者，张骞则是《周易》思想的落实者。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则是对理论的具体应用。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周易》“通变”和“忧患意识”科学性和正确性。

三、以《周易》《渐》卦分析张骞“凿空”西域精神及生命支撑

以北宋易学家邵雍《梅花易数》推张骞姓和名，恰好为《周易》《渐》䷴卦。此卦为异卦相叠，艮下巽上。上卦为巽，巽为木；下卦为艮，艮为山。木植于山上，不断生长。比喻人立身于道义，培养其德行，进而影响他人，移风易俗。所以卦名曰渐。渐，就是渐进的意思。不论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渐》卦之意正体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经过各种艰辛和困难。我们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张骞出使西域经过的描述：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时北，汉何以得往使？时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馀，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使君。^②

由《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历程，简略把张骞出使路线图勾勒出来：参照《渐》卦六爻来分析：长安（公元前139）——匈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匈奴——长安（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从长安出发时，正值25岁青春年华，十三年之后回到长安将近不惑。我们把其经过匈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匈奴这六个国家和《渐》六爻相比附，惊奇地发现张骞出使西域的经历非常切合《渐》卦六爻辞之意。张骞出使西域犹如鸿雁寻找自己目标中家园一般起起落落。

^① 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533页

^②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渐》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初六爻辞是说“鸿雁飞行渐进于水涯边，就象童稚小子遭逢危险，蒙受言语中伤，但能渐进不躁则免遭咎害。《象传》说：童稚小子所遭逢的危险，从初六渐进不急躁来看是没有什么咎害。^①大雁飞进水涯边有危险，对应比附张骞被匈奴羁押，有危险，但张骞没有急躁冒进，而是在匈奴十年时间里伺机等待机会，最终逃离了匈奴继续前行。爻辞“无咎”预示张骞虽处困境，但没有性命之忧。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六二爻辞意思是说：鸿雁飞临水边高处磐石，饱饮饱食，自得喜乐。筮遇此爻，吉利。鸿雁飞临水边高处磐石饱食，自得其乐，对应比附张骞逃出匈奴，进入大宛国，受到大宛国王优待和帮助，继续前行实现其目标。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御寇，顺相保也。

九三爻辞意思是说：鸿雁走到旱地上。筮遇此爻，丈夫出征可能不再回返，妇女怀孕可能流产，这是凶险之兆。但有利于抵御敌寇。此爻辞可比附张骞到达康居国，但爻辞之意有凶兆，预示张骞在康居国计划不能实现，但不会遇到阻力和危险，结果康居国王把张骞送到大月氏。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六四：鸿雁飞到树木上，有的停息在河边堆放的桷木上。筮遇此爻，没有灾难。《象辞》说：有的鸿雁停息在河边堆放的桷木上之所以没有灾难，因为六四阴爻居于九五阳爻之下，像人有驯服而又谦逊之德。此爻辞比附张骞在大月氏境遇，张骞劝大月氏和汉联合抗击匈奴，但大月氏国国王已死，王后因为迁居之后人民生活安稳，不愿意再卷入战中漩涡，张骞在大月氏国久等王后也没有明确抗击匈奴想法，计划虽说失败，但没遇到生命灾难，爻辞阐述无灾恰合张骞在大月氏情况。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九五爻辞是说：鸿雁走到山陵上。筮遇此爻，妻子多年不能怀孕，但始终不会被人取代，吉利。《象辞》说：始终没有被人取代，吉利，妻子实现了与其丈夫和谐白头的愿望。此爻辞比附张骞在大夏国境遇，张骞在西域各国奔走多年，没有说服一个国家可以联合西汉共同抗击匈奴，犹如女人“多年不能怀孕”一样没有结果而返。虽说爻辞之意不是非常符合张骞境遇，但寓意却是基本同理。

上九：鸿渐于阿，其羽可用为仪，吉利。《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岩，不可乱也。

上九爻辞是说：鸿雁走到山头上，它的羽毛可用来编织舞具。这是吉利之兆。《象辞》说：鸿雁的羽毛可用来编织舞具，这是吉利之兆，编织舞具的羽毛应该纯而不杂，像人心志不乱。此爻辞比附张骞返回长安途中又被匈奴抓获，但张骞意志坚定，最终逃出匈奴国，回到长安。吉利之兆预示有凶险之境但终归会无生命之忧。

上述是从《渐》卦爻辞之意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历程做比对分析，《渐》卦阐明事物

^① 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410页



发展过程中“循序渐进”道理。鸿雁从低到高，由近渐远，有序而不错乱。而张骞出使西域历程是从近渐远，险境和顺境交替，但张骞始终没有放弃朝廷交给他的使命，正如鸿雁有序而不错乱一样起飞降落。正是这种使命感支撑着张骞无论处于何种困难及恶劣环境之下，都不放弃生命，不放弃自己所肩负责任。

四、以《周易》管理学视角分析张骞“凿空”西域当代启示

当代历史教科书对张骞“凿空”西域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张骞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开通丝绸之路的探险家，外交家。从知人论世角度分析，人是不能离开时代而生活的。还需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只有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为何出使西域及出使西域的历史意义。综合以上论述，从《周易》角度分析张骞出使西域当代启示：

1、最高统治者正确决策是首要因素。《周易·系辞下传》“变通者，趣时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①意思是说变化会通，是趋向合宜的好时机；吉凶的规律，守正就能致胜；天地道理，守正就被万众敬仰；日月的道理，守正就能焕发光明。如果没有汉武帝因时而变改变“和亲”政策，张骞不可能有出使西域的机会。如果汉武帝不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不重视儒家学说，尤其不重视《周易》一书在儒生中推广和学习，《周易》“通变”及“忧患”思想被应用到治国理政及外交活动中，也不可能有西汉之后鼎盛和辉煌。

2、选拔合适人才至为关键。正确决策是首要因素，但选拔人才执行领导决策也至为关键。张骞作为被选拔人才出使西域，肩负着朝廷使命，有持之以恒坚强意志和处困弥坚精神意志，这是完成出使任务的必须条件。《周易·恒》卦上震下巽，震为雷为刚，下巽为风为柔，刚上柔下，刚柔相济，故能恒久而终究成功。张骞出使西域，历经多年磨难，以“君子立不易方”的信念而返回汉朝，正是践行《恒》卦“人贵有恒”的体现。

3、外交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大计。张骞出使西域是以外交家身份前行的，历经坎坷磨难，时间历时十三年，虽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对西汉境外的各国基本情况有了详细了解，也了解各西域各国的真实想法，便于进一步的沟通和联合。正如《周易·益》“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②怀抱真诚信实态度和世界各国交往，毫无疑问是吉祥的事情，那么世界各国也必将以真诚信实的感惠之心报答我们的恩德。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的外交先河，有惠于汉朝后期兴盛，奠定了当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的基础。正如史书评述张骞历史功绩：“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

^① 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532页

^② 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326页



参考文献：

- 1、黄寿祺 张善文 撰《〈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 2、司马迁著《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 3、班固著《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邢春华，汉族，渭南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易学。